

【万松浦讲稿之十一】

君子潜伏

□张炜

现在是物欲统领了一切，人为了所谓的成功会不择手段，在这种情势之下也就不得不出现“君子潜伏，小人横行”的局面了。

人文教育让人忧心，但这已经不是大学教育所能解决的，因为这是社会性的，是大环境才能决定的。虽然有时某个小环境也很重要，比如遇到一个好的老师，就会好得多。去哪儿找这样的老师？他不光要具备丰富的知识、有好的方法，还要是一个优秀的个体，具备强大的带动力，有示范作用，有人格的魅力——后者才是最重要的。

自古以来，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遇到一位好的导师。为什么一个有志向的青年总是梦想到某一个院校去求学？因为那里有他心目中的一位大师。大师的不同，在于他不仅掌握了深邃的学问，还具有人格的力量。他往那儿一坐，就有一种非凡的气质将人吸引。或许只是跟他相处很短的一段时间，他整个生命放射出来的无形能量就会作用于你，让你久久不能忘怀。

有许多人讲过类似的经历——比如一个很瘦的小老头，他在海内外很有影响，演讲的时候坐在那儿，只一会儿工夫，一种难以言喻的气氛就笼罩了整个厅堂。他开始讲话了，语速不快，道理似乎也不费解，但就是有笼罩力、有穿透力，让听众深深地沉浸其间。

现在不光大学里难寻这样的人物，就是更高一级的学术场合也很难遇到。相反，我们总是看到风头很劲的“百事通”，他们通常边讲边议地掉书袋，说一些很时髦的聪明话，极尽势利和乖巧，浪得虚名。这些人习惯于背诵时代的台词，注重的是现场表演效果，听者跟上热闹了一场，事后越想觉得不值。

我们把掌声送给了这一类人，心里会感到亏欠。因为究其实质，他们那点学识和见解大多都是书本中、时尚中的投影和反射。最主要的是，我们从中感觉不到人格的力量。

也许我们对教育环境要求太高，但仔细想想这不过是基本的要求。大学么，总得存有一些杰出的人物。可是众所周知，因为各种原因，几十年来我们不停地折腾，折损大师，葬送学问，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恶果。有的大学已经没有威信，校园里吵吵闹闹，再也不是一个让人敬畏的场所。那里一切都平平淡淡，上上下下只对物质利益趋之若鹜。还有一些人经常

发出吓人的尖叫，不做学问，无法让人尊重。

说到大师，他们即便仍然活着，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也会有很大的问题。现在的许多大学越来越集约化、企业化、量化标准化、行政化和衙门化——当然他们会称自己为“现代化”，还喜欢说“跟国际接轨”——真是荒唐之至。现在已经走入了最肤浅的模仿，掌握的是一种“科学饲养法”，竟然在人才教育领域形成了“出品加工一条龙”。

我们的孩子经过了刻苦奋斗，最后却送到了这一类地方，这怎么了得？

我们没有躬逢其盛，没能亲眼目睹那些场景，算是错过了大师。但总有些记录文字、有些口耳相传中保存下来的故事，让人感动不已。一本书里记载了一件事，后来又有一位文化老人亲口讲述了他的这个经历：许久以前，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情了，有一天他正好路过某个大学的一条走廊，听到有人在旁边的屋子里用很重的地方口音在那儿大声宣讲，慷慨激昂。声音之激越，让他一时驻足，很想进去一睹风采。他估计那个大屋子里一定是爆满的，那情形就像一场礼堂里的报告会。他太好奇，忍不住轻轻推门进去，看到的场景却令其大吃一惊——只是一间不大的教室，台上是一边走动一边大声言说的先生，而台下呢，只有三个学生在听。

慷慨激昂的宣讲者是谁？就是著名的大学者熊十力。那么大的学问家，只为三个学生倾力宣讲。讲述这个亲身经历的老人说，当时他实在是震惊了。

这似乎是很小的一个细节，但却是真实无误，发人深思。今天的哪所大学里、哪个人身上还会发生这样的事？我们不敢想象。

说实在的，现在的某些大学怎么看怎么不像大学。一些曾经名头很大的学府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已经从面貌上彻底地转型了——看上去跟商业大街毫无区别，到处店铺林立，叫卖声四起。原来那种肃穆和隆重，还有蓊郁林木下走动的一些文化老人，全都不见了踪影。

没有什么让人景仰的东西，空气里传递的都

是物欲的气息。

老牌大学如此，刚建的大学更要命，没有大树，簇新的大楼倒盖了不少。有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就不惜重金从四处移栽大树，一棵树几十万，还在树上挂吊瓶点滴营养液让大树活下来。他们只想以老树增加这个学校的肃穆感和历史感，但即便辛苦搞成了也无济于事——不久还会有更多的商贩在这里安营扎寨，有许多饭店旅馆之类，各种车辆会响着高音喇叭挤成一团。

再说，有了大楼和大树，有了林荫大道，让屋子爬满青藤，就让人景仰了？不要说做到这些很难，就是千方百计做到了，也不过是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。

这与大环境的教育力、影响力是分不开的。坏的榜样具有极大的感染力。以前之所以能培养出那么多让人景仰的人物，就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同、大环境不同，再加上有大师的身影——人们都敬畏他们、羡慕他们、模仿和学习他们。他们不仅有丰厚的知识，还有知识给予的那种气度和魅力，有风骨，是这些合在一起感召着我们。

现在是物欲统领了一切，人为了所谓的成功会不择手段，在这种情势之下也就不得不出现“君子潜伏，小人横行”的局面了。一个环境中，当君子不得不潜伏起来，小人也就通行四方了。于是许多地方早就不是事业的竞赛，而直接就是“小人竞赛”。卑鄙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获取了最大的利益，君子先是愤怒，然后是无言，到最后也只好潜伏起来了。

君子潜伏是为了保存自己。潜伏有时候也是一种“存在”；“缺席”有时候更是一种必需。

野蛮者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，这算什么生活？如果总是如此，教育者、师长们，无论怎样设法让自己的学生向往文明、远离野蛮，说到口干舌燥也难以奏效。因为现实才是最好的教育，他们已经无法再相信美好的言词了。

讲到这里，我们心里未免有些过于沉重。

但是我们的道理归结到哪里才好？仍然还是要讲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——这正是人类的韧性，我们一代一代都依靠这韧性生存和奋斗着。因为说到底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、山东省作协主席)

【域外走笔】

美国人非常重视诚信。人立足于社会，人和人交往，诚信是第一位的。我的一个亲戚从江西去美国在旧金山机场通关安检，检查员问她有没有带食品，你如果说NO，他那里就OK！但是我那亲戚犹豫了一下说，“我不知道什么食物是不能带的。”于是开箱检查，发现有烧鸡，问她还有什么，她说另一只箱子里有板鸭。“几只？”“四只。”当即取出连烧鸡一起被扔进垃圾桶（那亲戚好心疼）。检查员说，考虑到你还算诚实，从宽处理，不罚款（如果第二次再犯，就要罚600美元），只在出入境管理卡上记下一项“违规”。这样，她以后出入海关就都必须接受开箱检查了。你在这方面的不“诚信”纪录将永远陪伴着你。

《纽约时报》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。美国堪萨斯城

诚信在美国

□宋遂良

郊一所高中，118名二年级学生在完成一项生物课作业时，有28名学生从互联网上抄袭了一些现成材料，被任课女教师Pelton发觉，判定为剽窃，28名学生的生物课得分为零，并面临留级危险。在一些当事人家长的抱怨和反对下，校方要求女教师提高那些学生的得分，这位27岁的女教师愤而辞职。面对社会舆论压力，学校董事会不得不在体育馆举行公开会议，听取各方意见。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女教师。该校近半数教师表示，如果校方降格满足少数家长修改成绩的要求，他们也将辞职。他们认为，教育学生成为一名诚实的公民远比通过一门生物课更加重要。Pelton则说，她在带学生的第一天，就和学生订下规矩并由家长签字认可。规矩称：“所有布置的作业都必须完全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，欺骗或剽窃将导致课程失败。”女教师每天都接到十几个支援她或打算聘用她的电话。一些公司还向学校索要当事学生的名单，以确保公司今后永远不会录用这些不诚实的学生。

美国人都有一份信誉记录，并有一个积分，保存在信用局（据说那里保存有一亿七千万美国人的信用记录）。个人的信用评估从325分起。随着诚信记录的增多，积分就可以提高，据说最高可达900分。在美国办银行卡、购物卡、驾照、安装电话、买房都必须提供个人信用记录。如果你很诚信，但从不参与考验诚信度的社会活动，那你的记录也只能是0。比如你到银行去贷款，你借一次，按期归还一次，你按期交税、交罚款，你的信誉分就会增加，你信誉度愈高，可贷的款就愈多，付出的利息也就愈少，反之，你不按时归还，就会减分，下次要贷款时就要减额、增息。驾照也是这样，你违规越多，罚款越多，保险金也就越高。这就迫使美国人严格遵守法律和规定，保持自己的“清白”，因为说谎和失信的代价是沉重的、无可挽回的。有一位留学生告诉我，他有一次开车过收费站少了0.25元，收费站没难为他，给他一张通知单让他两周内去补交。他忘了交，结果罚款300元，并有了一项信誉不良的记录。他后悔死了。最近发生的印度女外交官在纽约受辱事件，虽有美国的“大佬”做派，但他们也是以那外交官“伪造女佣的签证申请文件”为由由司法机关执行的，因为她违反了诚信。

有点像“疑罪从无”的原则，美国人对人首先就是相信。商店从没有见过查看发票、盖戳、设保安之类的事，我也没见过防盗预警器。邮寄、网购的东西，不管多么贵重（包括支票、护照、金首饰等），递送员都是悄悄放置在门口，不需要签收、验货，也从没听说过丢失的事。去年房东趁我们全家外出旅游时雇人来修理地下室，我们回来后发现少了一个ipad，打电话告诉他。他说可能是雇的人有的手脚不干净，表示道歉并随即寄来一张支票赔补，并没有作任何调查核实。

这种制度和风气突出了个人的责任感，告诫每一个人随时随地要对自己的一举一动承担后果，鼓励人们慎独，保持自己的信誉与尊严，不要随意、轻率行事，“勿以恶小而为之”。这种诚信体系节约了大量的社会资源，减少了几多运作成本！但单一的管、罚，仍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我想起2007年的一个星期天，我和在丹佛的女儿带着孩子一起到她公司去参观，进门有一个放糖果的大抽屉，两个孩子打开抽屉就挑着吃，并往口袋里塞，我也挑了两颗放在口袋里。回来说起这件事情，女婿笑着说，那门口是有自动录像的，让人看见了恐怕会损害你这个中国教授的形象吧。听他这一讲，我晚上辗转反侧，睡不安稳，总回忆自己当时的一举一动……直到女儿几天后说，糖果放在那里就是让客人吃的，只要不出事那个录像是不会有人去查的，我才稍安，但至今仍觉愧疚。我平日是很注意在外国人面前维护中国尊严的啊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师范大学教授)

